

荣誉偏执、身份迷思与 日本战略偏好的转向^{*}

陆 伟

内容提要：近年来东亚安全格局重构的最大变化之一，是日本安全防务政策开始表现出积极的扩张性特征。日本战略偏好的转向是导致这一现象发生的决定性因素。文章在借鉴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荣誉这一精神性动机内涵的重新界定和理解，试图揭示荣誉动机下身份迷思和地位偏执与国家现实主义战略选择的内在关联和因果逻辑。进入 21 世纪以来，日本文化上的最大变化就是确立了荣誉在国家动机层级中的绝对支配地位。正是由于这种传统价值观和思维与不断演进的“正常国家”实践相结合催生的对大国身份、地位的执迷和狂热，驱使日本在战略取向上越来越倾向于接受冲突的零和性质、大胆贯彻防务上的进攻主义、采取主动塑造国际事务的外向性姿态和推行民族主义议程等，从而导致了其战略偏好向现实主义的重大转变。由此决定了中日关系的磨合将长时间地在摩擦甚至激烈对抗中来实现。

关键词：荣誉偏执 身份迷思 战略偏好 现实主义转向

作者简介：陆伟，同济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

近年来，随着中国实力和影响力的快速提升，其和平崛起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压力也与日俱增。在造成中国崛起困境的诸多外部因素中，日本的安全政策取向越来越成为仅次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大干扰变量之一。

^{*} 本文系 2015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治国理念之外交战略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5ZDC002）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当代亚太》杂志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特别是自安倍第二次上台以来，日本因素显得更加突出。^①人们不禁要问，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信守和平主义发展道路的日本为何在外交政策上表现出如此咄咄逼人的外向性姿态？其战略偏好是否发生了转向？这种转向基于何种动机？它是如何刺激对外战略选择的？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又会怎样影响未来的中日关系和东亚国际格局的走向？厘清这些问题，对于认清中日关系“政冷经凉”的根源，寻找缓和与中国崛起困境的应对之策至关重要。

一、荣誉动机与进攻性战略偏好之间的因果机制

对于日本战略选择的改变以及由此采取的对华强硬政策的原因，目前学界和政策研究界的分析路径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一是秉持传统的地缘政治和权力竞争视角，重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带来的战略刺激和中国崛起导致的战略恐惧；^②二是基于国内政治和外交决策分析的视角，关注日本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右倾保守主义的兴起、权力架构和决策机制的调整等因素。^③就前者而言，日美同盟一直是战后日本外交战略的基轴，配合美国

① 吴怀中：《安倍“战略外交”及其对华影响评析》，载《日本学刊》2014年第1期，第46~68页。

② Ian Bremmer and David Gordon, “US Needs Japan as Its Best Ally in Asia”,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9, 2012; Michael Auslin, “Shinzo won’t Go”, *Foreign Policy*, April 23, 2014,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4/04/23/shinzo_wont_go_abe_japan_obama_asia_pivot; 杨伯江：《美国战略调整背景下日本“全面正常化”走向探析》，载《日本学刊》2013年第2期，第3~5页；信强：《“次轴心”：日本在美国亚太安全布局中的角色转换》，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4期，第39~53页；刘卫东：《美国对中日两国的再平衡战略论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0期，第81~97页；李振广、吕耀东：《试评析日本在美国“再平衡”战略中的角色》，载《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11期，第10~15页；森本敏『日本の瀬戸際』、実業之日本社2011年；PHP『日本のグランド・ストラテジー』研究会編『日本の大戦略』、PHP研究所2012年；樋渡由美『専守防衛克服の戦略』、ミネルヴァ書房2012年。

③ 张勇：《日本战略转型中的对外决策调整——概念模式与政治过程》，载《外交评论》2014年第3期，第43~65页；时殷弘：《日本政治右倾化和中日关系的思维方式及战略策略问题》，载《日本学刊》2014年第2期，第1~14页；吴怀中：《日本政治变动及其对华影响——一种结构、生态与政策的演化视角》，载《日本学刊》2013年第2期，第16~33页；陆伟、蔡建国：《冷战后日本政军关系的演变及其影响探析》，载《日本学刊》2013年第6期，第49~66页；吕耀东：《论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民族主义特质》，载《日本学刊》2014年第3期，第1~20页；徐万胜：《安倍内阁的“强首相”决策过程分析》，载《日本学刊》2014年第5期，第55~74页；井上寿一ほか編『日本外交の再構築』、岩波書店2013年；信田智人『冷戦後の日本外交——安全保障政策の国内政治過程』、ミネルヴァ書房2006年。

的战略需要是历届日本政府共同的核心战略目标。因此，作为影响日本对外战略的常量，美国因素发挥何种以及多大程度的作用主要取决于日本当政者的工具性目的。而对中国崛起的反应更是为主观认知所左右，“中国威胁论”和“中国机遇论”在日本决策层中纠缠、变换，这一看似矛盾的心理和现象实质上也主要根植于其不同的战略选择。就后者而言，日本国内的保守主义和政治右倾化总体上即是一个自我不断强化的过程。^① 如果仅以这期间日本在安保政策和制度上的一系列修改举措来推断，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关联。但我们依然有必要进一步厘清中间的作用机制，因为从各国对外战略演变经验来看，政治理念只是影响战略走向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② 而日本在冷战结束之后的总体保守主义的大氛围下也的确出现过不同的外交政策选择。^③ 总之，上述两种研究路径由于缺乏关键的中介变量，对日本战略转型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方式都无法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本文认为，战略偏好的改变是日本转向外向型进攻战略和对华强硬政策的关键变量，^④ 这种转换的实现和程度则取决于基于荣誉的动机。

何谓战略？古今中外的政治家和学者基于各自的理论旨趣和界定标准，给出了许多不同的定义。其主要分歧在于是将战略限定在军事领域，认为它是国家应对武力冲突和战争的原则和方法，还是超越军事事务范畴，认为它

① 参见张广宇：《冷战后日本的新保守主义与政治右倾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李寒梅：《日本民族主义形态研究》，商务印书馆 2012 年版；刘江永、王新生：《战后日本政治思潮与中日关系》，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

② 例如，具有强烈保守民族主义色彩的小布什政府却在“九一一”事件后奉行全面对华接触战略，甚至将中国视为“利益攸关方”，从而使中美关系进入了其所界定的“历史上的最好时期”。反倒是崇尚理想主义和“巧实力”外交的奥巴马政府在中国一再呼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背景下，依然推行旨在遏制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关于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理念，参见胡欣：《新保守主义和保守民族主义对美国外交的影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 年第 8 期，第 32~39 页；孙哲：《美国霸权的发展维度——奥巴马政府全球发展战略评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 年第 11 期，第 55~63 页。

③ 福田康夫执政期间，搁置“价值观外交”，倡导“和平合作国家”论，对华贯彻战略互惠战略，与前任安倍内阁和后任麻生内阁大异其趣。之后上台的民主党内阁也在鸠山由纪夫执政期间大力推崇亚洲一体化和集体安全。参见吴怀中：《日本对华安全政策的理论分析》，载《日本学刊》2010 年第 2 期，第 3~16 页；赵宏伟：《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中日关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 年第 9 期，第 19~39 页。

④ 有学者认为，导致日本对华趋于全面强硬的最重要原因是面对“中国崛起”时日本战略选择的变化，这一分析更接近于实际，但依然缺乏对背后深层次动因的揭示。参见朱锋：《权力变更、认同对立与战略选择——中日关系的战略未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 年第 3 期，第 16~25 页。

是国家运用可使用的力量来实现特定目标的总体指导理念和政策选择。^① 但无论是基于军事战略的狭义界定，还是着眼于大战略的广义界定，都只是聚焦于战略的物质维度，而或多或少忽视了精神维度。正如默里（Williamson Murray）所言，“理论都太经常地针对固定的价值，但在战争和战略中，绝大多数事物都是不确定的和可变的。更糟的是，这样的方法使探究偏向于客观因素，而战略包含着人的激情、价值取向和信念，它们极少可以量化。”^② 战略偏好的视角就契合了从这一层面完善战略分析理论的需求。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战略的理解依然承袭对大战略的主流界定，即战略是“在平时和战时，发展和应用政治、经济、心理、军事权力以达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③；而将战略偏好界定为国家在特定时空环境中面对国际机遇和挑战，在威胁认知、利益排序、手段选择、政策风格等方面表现出的（很多时候是背后潜藏着的）倾向性喜好。上述定义表明：其一，战略偏好对战略行为起着重要的提示（以自我的心理暗示体现）和导向作用，因而具有本体性的地位；其二，作为一种心理活动，它有赖于动机的触发和支撑。

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帮助我们识别了各种动机的不同功能，进而构建了以荣誉动机为核心变量的分析框架。完整、系统地做出这一理论贡献的是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勒博的理论建构以古希腊先哲对人与秩序的思考为起点，通过对柏拉图等先哲关于人性中普遍要素的思想的重新解读，明确区分了驱动人类行为的三个普遍动因：欲望（appetite）、激情（spirit，又译作“精神”）和理智（reason）。其中，欲望是指各种欲求，如对财富的追求；激情则使人产生自尊，推动人追求在同侪和社会活动中获得认可从而满足自我；理智既是一种动机，又带有工具性，它旨在导向良善生活，节制欲望和激情。当理智的目标无法实现时，恐惧（fear）便由此而

^① 李际均：《论战略》，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时殷弘：《国际政治与国家方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周丕启：《大战略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门洪华：《中国国际战略导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Jack Snyder，“The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Implications for Limited Nuclear Operations”，a Project Air Force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Rand, September 1977, <http://www.rand.org/pubs/reports/R2154.html>；左希迎、唐世平：《理解战略行为：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第178~202页。

^② 威廉森·默里、麦格雷戈·诺克斯、阿尔文·伯恩斯坦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时殷弘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③ 参见钮先钟：《战略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页。

生。恐惧是一种情绪，并非人类行为的动因之一，但它是一种强大的次要动机。勒博认为，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根植于欲望，现实主义则强调恐惧，而激情的重要性在现代却被忽略。^①在他看来，对激情的失衡追求比对欲望的失衡追求更容易导致失序，将激情置于价值中心的社会更容易陷入战争。为此，他统计了1648~2008年间有崛起国、主导国和大国参与的阵亡人数超过1000人的战争，发现有68%的战争源于地位、荣誉或复仇的欲望，而安全和利益所能解释的战争分别仅为18%和7%。^②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对于荣誉和地位的考虑以及与之相伴的复仇心理是导致国家采取进攻性战略的首要动因，而安全需要和经济利益不过是次要原因。^③

勒博构建的这一激情基础上的政治范式，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行为体行为选择背后深层次的动机分布，尤其是基于地位、荣誉的内在心理所扮演的角色。但是，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由于勒博将自己研究的目标指向构建一种宏理论，试图与现有的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等主流范式形成竞争，导致了其因过分注重国际体系层次的建构，而忽视了对于荣誉等人性动机与行为选择之间的关联机理的深入探讨，同时对在何种文化背景和政治条件下，社会的主体意识才能实现向基于荣誉的动机转换也缺乏足够的论证。^④因此，我们在运用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来分析日本为何转向进攻性的扩张战略时，首先需要进一步厘清基于荣誉的动机影响国家的国际行为的内在机理和逻辑。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界定的荣誉是建立在行为体自我建构的角色身份和地位的基础上，以对后者的获得和占有为满足，并不依附于其所归属的某一群体，更与群体的共享荣誉无关，在表现形式上呈现出排他性和偏执的特征。^⑤

① 理查德·内德·勒博：《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陈锴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11~15页。

② 理查德·内德·勒博：《国家为何而战？》，陈定定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4年版，第106~127页。

③ 同上，第159~163页。

④ 陈拯：《人性动机、战争原因与东亚身份政治——以勒博〈国家为何而战〉为中心的讨论》，载《当代亚太》2014年第3期，第47~62页；余潇枫：《导读：透析国际关系的“文化之维”》，载理查德·内德·勒博：《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译序。

⑤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荣誉观则完全不同，它强调荣誉的共创共享。正是基于这样的价值取向，中国的国际战略从与世界各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认识出发，提出了“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另外，荣誉执迷下的恐惧是对自身地位丧失的过度忧虑，而安全困境下的恐惧则是对危及生存权的被动反应。^① 这大致区分了国家主观臆断和过分夸大对手威胁并做出相应的政策选择究竟是基于荣誉动机还是源于安全困境。因此，荣誉涉及对身份和地位的执着追求；同时，源于对身份、地位及其现实境遇的不同理解而产生的情感反应，又与自尊、尊严和屈辱等概念密切相关。基于此，我们可以将这些因素整合在一起，通过身份、地位的关键链接，构建荣誉动机理论的分析框架。

荣誉既是身份和地位的社会性彰显，又是身份和地位的外在表征，彼此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性。将它们整合在一起会发现，基于以下四种因果机制，源自荣誉和身份的动机在推动国家形成进攻性战略偏好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

首先，执迷于荣誉的国家总是夸大战略环境的零和性质，降低威胁判断的门槛，从而使其与对手的身份、地位之争以激烈的传统安全竞争形式呈现。

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认为，对手及其造成的威胁的性质（零和还是非零和）是决定一国战略文化类型的三种核心范式之一。^② 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理论的前提假设是物质主义，认为国家之间的零和互动是基于一种物化的权力和安全的稀缺性；甚至出于保持逻辑统一性和理论简约性的需要，将地位也看成是一种绝对稀缺的物质资源，以使地位竞争作为零和游戏的理由成立。^③ 然而，勒博注意到，由于劳动分工的发展，世界的全部财富是可以扩展的；同时，国家对物质利益的需求也可以通过合作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满足。自由主义者就强调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中欲望的重要性，并认为民主的贸易国家更倾向于保持彼此之间的和平关系。随着发达国家数量的增加及其财富的增长，物质开始失去其作为地位标志的价值；而荣誉则完全不同，荣誉更是一个关系概念，“如果所有人拥有它，就如同无人拥有它”。可以获取的荣誉是有限的，荣誉世界极富竞争性。^④ 对霍布斯式的荣誉观而

① 由于两种恐惧在表面上没有大的不同，为了与现实主义的理论解释划清界限，区分两类不同性质恐惧的意涵和由来，勒博从满足激情的角度来定义前者。

② Alastair Iain Johnston, "Thinking about Strategic Cul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4, 1995, pp. 46-47.

③ Fred Hirsch, *Social Limits to Growth*,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27.

④ 理查德·内德·勒博：《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第 52、112 页。

言，荣誉世界的封闭性排除了对其共同拥有的可能性，其排他性决定了除非行为体独占性地享有荣誉，否则不能得到满足。因此，与合作相比，冲突就成为惯例。

身份、地位因素的掺入，使荣誉的零和性质更加突出。这种情况最有可能发生的场景是，一国或集团被实力较弱的另一国或集团所追赶，使对方获得了与自己相同或接近的国际地位。这是因为，地位高的行为体不接受其他行为体的领导，不承认其他行为体处于更高的社会地位。在基于荣誉的社会，相同社会地位的行为体之间的合作很难实现。一旦“荣誉之争被转变为地位之争，地位之争显得更不受约束，可能充斥着更多暴力”^①。

对陷入地位之争的行为体来说，很容易因荣誉可能受到轻视的敏感反应而对威胁代理和指涉对象实施安全化操作，由此将对手的敌人意象固化，认定对手本质的不可改变和战略意图的不可改变，^②从而为在判断何种冲突构成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时设定很低的门槛，并将这种威胁置于范围广泛的领域。^③尤其是在相对实力发生逆转性的变化或不平衡时，对其之于国家生存的意义或含义做出夸大性假设，过度敏感地解读对手的任何举动，最终会因理智无法控制激情而产生畏惧，并在“雪球效应”的作用下得以自我实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彼此惧怕关系重大，因为它们之间的畏惧程度极大地决定着它们的安全竞争烈度，以及它们发生战争的可能性。”^④那么，这种心态从何而来？荣誉动机显然能够做出更令人信服的解释。

对失去荣誉的恐惧心理导致在设定与对手的零和冲突中，必然以取得绝对优势地位为目标，强调遏制对手的必要性，选择对抗，甚至不排除暴力的手段。由此，行为体选择了向非合作的传统安全竞争的回归，它们之间在荣誉驱使下的地位之争也以激烈的传统安全冲突形式呈现出来。但“安全困

① 理查德·内德·勒博：《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第52页。

② 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3页。

③ 彼得·卡赞斯坦主编：《国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规范与认同》，宋伟、刘铁娃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8~239页。

④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页。

境”表面的背后实则是一种“地位困境”^①。其中，悬而未决的领土争议因其作为国家荣誉的标志最具象征性意义而成为冲突的引爆点和聚焦对象。基于荣誉的领土争端超越了主权和军事安全的范畴，更将地位、尊严、民族情感和历史记忆等牵涉其中，构成了国家在领土争端问题上显示强现实主义战略偏好的主导性动机。阿尔萨斯—洛林（Alsace-Lorraine）在法德几百年欧洲争霸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即是最好的例证。

其次，追求荣誉至上的国家更愿承担风险，敢于为赢得地位冒险，崇尚进攻主义。

一个国家风险偏好的大小，决定了其对进攻性还是防御性战略的选择。托利弗（Jeffrey W. Taliaferro）借鉴经济学中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认为国家在预期自己处于获益状态时更倾向于规避风险，而在预期自己处于损失状态时更愿意接受风险。托利弗的这一发现，对于探寻国家不同风险偏好产生的根源提供了重要启示。但他并没有将物质权力与荣誉、地位上的损益做明确的区分，而只是笼统地指出，国家的冒险行为是由避免实力、地位和声誉等受损比在这些方面获利的前景在领导人的考量中所占的分量更重导致的。^②

然而，根据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研判国家承担风险的倾向性因素，不仅要分析危机关头它对于获益或损失的不同反应，更要分析这些收益和损失的性质。甘冒风险的意愿会随动机的不同而改变。^③ 具体而言，前景理论的创建和检验着眼于物质利益的损益，即它首先是一种关于欲望的理论。安全语境下的风险偏好与前景理论的预测相似，也存在着规避或接受两种可能。不过，基于恐惧的心理，损失会被理解为非常大且迫在眉睫，行为体可能更愿意通过形成均势和先发制人来承担风险，也有可能更愿意跟随强者来规避风险。这样，行为体损益的区别与承受风险之间便不再存在关联性。而当荣誉成为主导性的动机时，对这类行为体来说，失去荣誉是不可

① 蒲晓宇认为，“地位困境”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一方试图维持其相对位置的行为导致其他国家做出对应的反应，最后这种有代价的行为并没能改变原有的地位排序，却耗费了不必要的资源并带来矛盾和冲突。参见蒲晓宇：《霸权的印象管理——地位信号、地位困境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9期，第34~49页。

② Jeffrey W. Taliaferro, *Balancing Risks: Great Power Intervention in the Periphe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4.

③ 理查德·内德·勒博：《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第291、425页。

容忍的，任何风险都难以撼动其对荣誉或地位的追逐。同时，鉴于承担风险是获得地位和荣誉的重要先决条件，行为体在承担风险能够获益时也愿意接受风险。因此，甘愿冒险是基于荣誉的行为体“义无反顾”的唯一选择。一些著名的社会心理实验也表明，人们会出于对地位和荣誉等象征价值的追求不惜牺牲自己的物质利益。^①这在那些对身份和地位有“挫败”心理体验的国家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发现，对于谋求“获得地位”的国家来说，如果没有实现他者对其在“归属地位”等级中威望的认知，就会产生愤怒的感情，导致身份矛盾和冲突行为在国际体系中经常发生。^②身份认知的分裂是以结果性荣誉为导向的行为体无法容忍的，由此驱使其为摆脱这种困境而不惜铤而走险，直至他者认同自我界定的身份为止。总之，国家在战略上采取进攻姿态并不像进攻性现实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是基于生存或安全标准，^③而是更多的取决于基于荣誉和地位的动机。

在国际关系中，能够享受自致的大国身份下的荣誉实际上就是一种威望。荣誉和地位驱动下的战略性进攻姿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追求超强的军事实力。“威望就是实力的声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声望”，^④它能确保国家获得包括维护荣誉和地位在内的“绝对安全”，而这远远超出了保护国家安全利益的范畴。历届美国政府都无一例外地致力于发展对所有竞争对手压倒性的军事力量，就是为了维护“美国例外”的荣誉和至高无上的地位。第二，强调遏制的有效运用。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注意到，权力和威望是不同的，“威望包括一个国家权力的可靠性，以及它为实现自己目标而遏制或胁迫其他国家的意愿。”^⑤换言之，遏制的意志是国家威望显现的标志。行为体采取遏制战略的动因来源于威望的受损或其认为的实力差距。出于嫉妒或愤怒的情感宣泄，对威胁自身地位的对手，会设法削

① Bernardo A. Huberman, Christoph H. Loch and Ayse Öncüler, “Status as a Valued Resource”,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No. 1, 2004, pp. 103-114.

② Johan Galtung, “A Structural Theory of Aggression”,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1, No. 2, 1964, pp. 95-119.

③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44页。

④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宋新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页。

⑤ 同上。

弱其竞争实力，压缩其战略空间，限制其进入主流荣誉社会；通过军事上的“先发制人”、制度上的规制和意识形态上的孤立等多种手段来挽回荣誉。第三，重塑同盟和均势。结盟战略的根本转换是一国发生外交革命的重要表征；^① 同样地，一国战略偏好的转变也必然表现为联盟关系的调整。然而，国家自主选择结盟对象和重新塑造同盟关系并非出于安全或生存的目的，因为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家为此通常会采取“绥靖”“跟随强者”“推诿责任”等各种替代性战略^②（由此也带来了安全目标和防御战略之间逻辑上的矛盾）。能够做出更令人信服解释的，是国家在荣誉动机下对风险的偏好。根据戴维·莱克（David A. Lake）的分析，能否拥有独立同盟是衡量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安全等级的重要指标。一国在等级中所处的位置越高，其对外依附的程度就越弱，就越有资格关注制衡强国或威胁。^③ 一旦国家拘泥于提升在安全等级中地位的荣誉考量，就有极大的冲动为制衡对手而扩大自主选择结盟对象的范围，主动塑造新的均势格局。例如，沙特阿拉伯为展示作为穆斯林逊尼派国家盟主的威信，不依靠美国而与周边国家组建阿拉伯国家联合部队，通过主导对也门的军事干预，构建对什叶派大国伊朗的战略均势。

再次，道义责任的工具性利用为一国通过对外介入获取荣誉提供了可能，由此产生了干预国际事务的巨大动力，导致该国转而采取外向塑造的姿态。

荣誉决定了群体的相对地位。韦伯（M. Weber）指出，“身份群体的位置是在社会秩序之中，即在荣誉的分配领域。”^④ 一国要想获得有利的身份位置，就必须拥有与之对应的荣誉。荣誉越大，地位越高。荣誉对成为大国至关重要。然而，外在荣誉必须由他人赋予，而且只能凭借他人视为荣誉的行为才能获得。^⑤ 在国际关系中，这种能被视为荣誉的行为，在吉尔平看来，

① 在大英百科全书中，“外交革命”的词条对应于“同盟逆转”，后者在近代以来的外交中代表了外交战略和实践的一个根本转换。转引自陈志敏：《中国的外交创新是否需要外交革命》，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2期，第38页。

②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202~204页。

③ 戴维·莱克：《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高婉妮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1~72、150页。

④ 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75页。

⑤ 理查德·内德·勒博：《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第53页。

有其道义和功能的基础，它们源自主导国有能力提供公共物品，推动或保护安全、经济秩序和共同的意识形态及其他价值观。^① 因此，对于有抱负的国家来说，只有承担更多的国际公益责任，才能借助荣誉和威望获得大国的身份和地位。这就产生了国家对国际公共物品供给的工具性利用的巨大需求，从而增强了一国深度介入国际事务的意愿。例如，欧盟积极推动气候和人权等领域规则的制定，源自其维护作为国际规范主导者地位的目的，随之而来的便是在实践中干涉他国参加国际气候谈判的立场，大肆进行所谓的人道主义干预活动。

提供国际公共物品以及因之转向对外介入的程度，因国家在国际荣誉等级秩序中的位置或对荣誉满意度认知所处时期的不同，而在意志和进取性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冷战结束后，美国尽享“单极时刻”的荣耀和地位，导致其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意愿和规模大大降低。^② 在经济危机造成相对实力下降的情况下，美国总体上采取了战略收缩态势。^③ 而对立志成为国际政治主要“玩家”的国家来说，由于期望被视为大国的诉求得不到满足，或者所受的待遇低于其对自身地位的认识，而现有的物质资源又使其对扩大战略行为的空间抱有很强的自信，因而更渴望通过对外介入来获取荣誉。

由追求国际体系的主要成员国身份而引发国家对外介入的偏好，也符合社会身份理论的预期。^④ 根据这一理论，这类国家对于积极身份的社会承认具有强烈的诉求，为此，它们实施社会流入和社会创造等多种身份管理策略，学习和效仿其他大国的行为规范，或采取能够获得积极评价的、体现自身独特性贡献的行为，以向国际社会证明其享有大国地位是实至名归的。近几年国际关系领域的相关研究亦表明，对“边缘大国”的积极身份的追求使它们有极大的动力谋求对国际事务的积极介入，并在实践中投入更多的战略

①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第36～37页。

② 参见刘丰：《单极体系的影响与中国的战略选择》，载《欧洲研究》2011年第2期，第15～29页。

③ 参见左希迎：《美国战略收缩与亚太秩序的未来》，载《当代亚太》2014年第4期，第4～28页；王鸣鸣：《奥巴马主义：内涵、缘起与前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9期，第108～128页。

④ 张莹瑞、佐斌：《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发展》，载《心理科学进展》2006年第3期，第475～478页。

资源。^①

虽然国际公共物品的属性模糊了对这类物品的供给与对外介入的道义界限，然而，由于这种行为是基于荣誉的动机，以实现荣誉的最大化作为衡量取舍的价值坐标，因此，在实施的对象、议题、路径和手段等的选择上体现了自利的算计，甚至是一种排他性的安排，与公共物品的原有属性相背离，更与关注人类共同利益的道德责任无关。正如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所言，为提高自身声望而给予的对外援助和军事援助一样，也是一种形式的贿赂。^②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行为因其借助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名义获得了某种道义和功能上的优势而实现了“洗白”，从而使国家对荣誉的获得形成了有效的路径依赖，并因此积极地追求对外塑造。

最后，荣誉至上的国家从满足自尊的情感体验出发，突出自我价值的独特性，并为构建和阐述自身的特征与叙事而推行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议程。

自尊是一个人对其荣誉和地位的主观感受，而由于荣誉具有相对性，决定了它是一种有限的利益。因此，过度追求荣誉的人对其享有的自尊总会感到失望，由此产生持续不断的需求。人不仅通过个人活动，更重要的是借助其在自身所属的社会中的地位 and 成就获得自尊。勒博认为，近代之所以时常被称为民族主义的时代，是因为人们借助各种方式获得自尊，其中许多人得益于其国家的荣誉。^③ 当一国从满足群体成员的自尊需求出发，竭力建构在群际关系中相对优越的地位，以便能够激发和维系内向的认同时，即意味着该国推行了一项民族主义的议程。

国家建构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优势地位是通过展现本群体的标志性特征

^① Shogo Suzuki, "Seeking 'Legitimate' Great Power Status in Post-Cold War International Society: China's and Japan's Participation in UNPK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2, No. 1, 2008, pp. 45-63; 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Alexei Shevchenko, "Status Seekers: Chinese and Russian Responses to U. 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4, 2010, pp. 70-95; 陈拯:《身份追求与规范建设——“边缘大国”改造国际人权规范的动机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5期,第114~135页。

^② Hans Morgenthau, "A Political Theory of Foreign Ai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6, No. 2, 1962, p. 302.

^③ 理查德·内德·勒博:《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第123页。

来实现的，它实际上是与外群体的社会比较和积极区分的结果。^① 因此，首先体现为自我建构的认同以求“异”为不可或缺的前提，在实现的方式上，通常以建构偏见呈现，带有强烈的我族中心主义色彩。^② 这种建构偏见的过程的核心内容和思想内涵就是自我灌输本国神话般的历史，在赞扬自己民族性格的同时诋毁其他国家，并基于宣传的独一无二的历史强调自我定位，突出自我定位对于“民族特性”的决定性影响。^③ 借助不对称的群体评价，使国民从认知、情感和行为上认同自己所属的群体，以支撑他们的自尊。

维护身份稳定的本体性安全需求也助长了行为体推行民族主义议程的欲望。基于荣誉动机，当国家自我界定的身份没有获得国际社会的主体间认知时，出于对分裂的自我的焦虑和羞耻，会倾向于将内生的身份本体安全化。为此，该国在话语实践中，将极力向国际社会提供一个统一的自传体叙述来呈现其身份。^④ 国家的自传体叙述旨在呈现一个具有美感的自我，充满了对文化传统和核心价值的赞誉和对荣誉行为的描述，同时对那些于己不利的历史和事实轻描淡写或者视而不见，其具体形式有对内的历史教育、文学、影视作品和对外的政策谈话、舆论宣传等，以此来摆脱本体性不安全的状态。

简而言之，对荣誉的执迷在推动国家行为体接受冲突的零和性质、大胆贯彻防务上的进攻主义、采取外向性的扩张姿态和推行民族主义议程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在这四种作用机制的影响下，国家的战略偏好呈现出进攻性的特征。21世纪以来日本战略取向和行为的重大调整，完全符合上述理论假设的预期。

① H. Tajfel,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33, No. 10, 1982, pp. 1-39.

② 金太军、姚虎：《国家认同：全球化视野下的结构性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第7页。

③ 肯尼思·奥耶编：《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田野、辛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9页。

④ Brent J. Steele, *Ontological Secur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lf, Identity and the IR State*,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 25-48.

二、荣誉偏执：21 世纪以来日本主体动机的转向

分析最近 30 多年间日本对外主体意识的变化可以发现，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其动机的层级分布进入了分化重组的激荡期，经世纪之交内部的竞争和淬炼，基于荣誉的动机逐渐脱颖而出，进入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下半期后，明显地转变为国家的主导性动机。这一过程伴随着日本大国身份战略的实践，自我身份的主体间性追求，以及现实权力政治变化、历史思维惯性等三重因素的叠加，导致了日本的战略思维完全被对地位和荣誉的考量所占据。对身份分裂的焦虑、被竞争对手超越的耻辱感、对传统文化体验的自豪感所引发的对自尊的诉求，使日本追求荣誉的心理呈现出偏执和狂热的特征。

以往从文化的视角分析日本战略和外交行为的研究，更多地关注日本传统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表象特征，强调它们对当代日本对外关系的影响，往往带有文化决定论的倾向。然而文化既有传承性，又有情境性。本文提出以荣誉为核心的文化概念，是因为它是一个具有现代性的概念，不仅与日本传统文化有很强的继承关系，而且考虑到了战后日本文化的演化和在国际社会中的现实位置。更重要的是，它作为精神本源动力，在导致日本战略偏好转向上扮演了关键性角色。

日本的荣誉情结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它深嵌于日本文化的精神结构之中，构成了日本人精神世界的显著特征。南博言简意赅地概括了日本文化的核心精神构造，即“外的客我”意识高于“内的客我”意识，而内外结合的“客我”意识又高于“主我”意识。^① 这种文化结构给日本人的思维取向带来了深层影响。首先，对外在判断和价值的严重依赖，使得言行的选择以别人看到的自我或者自己觉得别人会看到的自我为依归。其次，“主我”脆弱导致的自卑，激发了对“争取优越感的补偿动作”^②的心理期许。最后，消除个体我的不确实感，需要集体我的出现，从而催生了前者以后者为归宿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因此，崇尚荣誉并以集体荣誉为终极关怀成为日本一个突出的文化取向。由于特别偏爱荣誉，因而会对耻辱的认知设定极低的判断标准

① 南博：《日本人的心理》，刘延州译，文汇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 页。

②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自卑与超越》，黄光国译，作家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95 页。

和产生过度消极的心理效应，一种被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视为代表日本民族特质的“耻感文化”^①也可以从中得到合理解释。

这种荣誉情结早已渗透到日本人的思维之中，并逐步形成其行为的导向和文化惯习。《万叶集》中的不少诗篇就流露出“扬名”的思想。到了镰仓时期，一部分阶层以“扬善名、忌恶名”作为重要的行为规范。后经室町时期的广泛传扬，及至江户时期，“重名”“知耻”已内化为日本社会普遍的行为准则。对荣誉的追求导致了地位或等级的增加。武士能够声名鹊起并位列四个阶层之首，正是依托了日本人精神上崇尚荣誉的心理。武士阶层崛起后，不仅将作为其道德准则的勇气、牺牲和忠诚推广为社会的核心价值，也进而奠定了近代日本国家主义的精神基础。正如新渡户稻造所指出的，“不能容忍被蔑视为劣等国家的这种荣誉感”构成了日本变化的原动力。^②

武士文化特有的对荣誉的偏执延展到国际关系层面，使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一直将获取地位和威望视为国家的目标。近代以来，日本战略文化的最大特点是以在国际体系中获得与西方列强同等的地位来定义荣誉，谋求对中国东北、中国台湾、朝鲜和琉球等地的殖民统治是在实践中兑现这种努力的重要一环。因为当时日本社会普遍存在一种观念，即殖民主义是西方列强的共有属性，成为帝国是获得大国地位的必要条件，日本也应当获取殖民地。^③然而，日本的强国身份并没有因其成为唯一的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对邻国的侵略而得到承认，相反，西方列强眼中的二流帝国形象使其陷入难以自拔的身份认知困境。“三国干涉还辽”、作为一战战胜国权益的得而复失等一连串的失败激起了日本的耻辱感和复仇心理。在日益扭曲的荣辱观的驱使下，对民族尊严和国家威望等精神价值的追求很快演化为军国主义的狂热和冒险，推动日本走上了全面侵华之路，甚至不惜以国家命运为赌注，在没有任何胜算的情况下对美国开战，最终落到了彻底覆灭的下场。

战败的命运使日本被迫接受民主化和非军事化的改造。发展道路的改变

① 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吕万和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54~157页。

② 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张俊彦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97页。

③ 德富蘇峰『大日本膨張論』、河原宏、藤井昇三『日中関係史の基礎知識』有斐閣1974年、77頁。

限制了其追求荣誉的手段，激情也因之失去了施展的空间。另外，美国提供的核安全“保护伞”，消除了其对本土安全的担忧。相比之下，战后物质资源的极度匮乏及百废待兴的现实，使得谋求国家的生存成为压倒一切的第一要务。于是，在日本的动机层级中，欲望取代荣誉及畏惧占据主导地位。“轻军事、重经济”的“吉田路线”的提出和贯彻，正是这种动机层级分布变化的反映。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日本对地位的诉求总体上首先是基于经济财富与民主政治制度，并藉此为国民提供高标准的生活水平。同时，在外交政策方面（如维护和平、对外发展援助、支援国际机构等）秉承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致力于在经济与福利领域贡献于国际社会。由于这条和平主义的道路给日本带来了实际利益和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巨大荣耀，其动机层级保持着基本的稳定。

显然，上述变化是在日本战后特殊的历史情境下发生的。由于外来规范与日本固有的价值体系存在着匹配难题，和平主义的规范和理念的內化不时遭遇极大的抗拒，而且即使实现了內化，也面临着退化的可能。^①事实上，伴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的结束，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保守的政治精英中就发出了重塑民族精神和价值观的呼声。他们指责国民浸淫于欲望，贪图物质享受，希望借助经济发展的奇迹，唤醒所谓民族的荣誉感和使命感。战后体制下形成的思考方式和思考方向由此出现分化，各种动机的混杂导致了重新排序的竞合期的出现。这一竞合期覆盖了整个八九十年代，作为酝酿启动阶段，其对日本转向基于荣誉的社会产生了三方面的影响。首先，从中曾根康弘的“国际国家”到小泽一郎的“普通国家”，不仅拉开了日本重构自我身份的帷幕，而且对国家认同和荣誉赋予了新的定义标准。其次，在海湾战争中充当了“冤大头”的角色，在造成与自我内心设定的身份形成巨大落差的同时，对以经济实力作为获得大国身份和地位标志的价值理念产生了鄙视。第三，身份的自我认知与他者认知之间的张力，将本体安全的安全化提上日程，并触发了以畅销书《一个可以说NO的日本》为代表的对自尊的渴望。

^① 柳思思：《从规范进化到规范退化》，载《当代亚太》2010年第3期，第145～160页；林民旺、朱立群：《国际规范的国内化：国内结构的影响及传播机制》，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1期，第136～160页；陈拯：《建构主义国际规范演进研究述评》，载《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1期，第135～153页。

进入 21 世纪以后，日本加速向基于荣誉的社会过渡。一方面，“普通国家”理念进一步上升为“大国化”的具体目标和实践，从小泉政府推进的以操弄民族主义议题为抓手的敢于“大国化”进程到安倍政府热衷于大国特有的“价值外交”的实施，^①反映了日本对大国身份的执着和定位的升级。另一方面，经济的长期低迷、中国的崛起和“入常”希望的再次破灭，使得日本对未来亚太权力分配中被边缘化的前景产生了空前的担忧。面对身份的分裂，日本保守主义政治精英和决策者下决心要为消除本体上的不安全状态而全面推动社会的文化价值取向向以荣誉为主导转型，以便将国民的共识统一到“大国化”的目标上来，并使严重的“受挫”心理在精神的追求中得到充分释放。

这一计划包括了如下步骤：（1）正式的政策宣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丽国家”概念的应运而生。按照安倍的解释，他所说的“美丽国家”，是“一个尊重日本的文化、自然、历史和传统的国家，一个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遵守秩序、具有尊严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被世界尊敬、信赖和喜爱的国家”。^②这一执政理念和政策目标的背后体现的是保守主义的政治精英和自民党决策层重塑日本文化价值取向的意图和野心。（2）教育改革。自从 90 年代末日本立法规定国旗和国歌以来，教育改革都被历届内阁视为与经济改革并列的两大主要课题。与经济改革徒有空论、蹒跚不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教育改革大刀阔斧并卓有“成效”，其重要标志是 2006 年“具有彻底颠覆战后教育理念意味”的“爱国主义教育法”的颁布。^③对于右翼领导人来说，唤醒社会公众的荣誉意识和民族自豪感的目标使教育改革变得更为迫切。在安倍看来，“日本战后教育最大的蹉跌之一是日本人的心灵深处固化着‘国家=恶’的方程式”，忌讳国家主义的倾向强烈。因此，当务之急是通过教育改革“培养有志向的国民，创造有品格的国家”。^④（3）外交实践。无论是小泉力推靖国神社参拜常态化，还是安倍鼓吹“价值外交”，其背后皆潜藏着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即在日

① 朱锋：《“价值外交”与亚洲政治新变局》，载《现代国际关系》2007 年第 9 期，第 10～11 页。

② 《安倍畅言“美丽日本”要让每个国民引以为豪》，央视网，2007 年 4 月 8 日，<http://news.cctv.com/special/C18213/20070408/101040.shtml>。

③ 依義文『安倍晋三の本性』、金曜日 2006 年、92～122 頁。

④ 安倍晋三『美しい国へ』、文芸春秋 2006 年、202、207 頁。

本的外交决策中，以荣誉为代表的政治价值观逐渐取代经济价值观。最为明显的表现是，日本领导人宁愿舍弃深化中日关系可能给日本摆脱长期经济低迷带来的巨大机遇，而首先选择通过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对正在崛起的中国进行制衡。

上述一系列举措的实施，使日本政治精英竭力推动的社会偏好的转向在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取得了重大突破，追逐荣誉渐成日本价值观的主流，经济财富和物质利益不再是其外交决策的首要动机，大国地位和荣誉开始在观念中占据优势地位。当然，作为过渡时期的特有现象，动机的层次分布还较为混沌和复杂，经济利益的思维惯性依然对日本的对外行为发挥着重要作用，从结果上看，即表现为中日之间的“经热政冷”以及“破冰之旅”“融冰之旅”“暖春之旅”等关系的短暂复苏。

安倍第二次上台执政后，不仅开创了战后日本政治史上前任首相时隔数年后重回权力中心的先河，更重要的是使以改变动机层次分布为中心的文化转型过程得以延续，并为彻底转向基于荣誉的社会铺平了道路。这是日本右倾保守主义阵营赐予安倍“梅开二度”机会的重要原因。而对安倍来说，特殊的家庭身世背景和成长教育环境，使得带有浓重精神价值色彩的政治基因深入骨髓。恢复国家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个人尊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构成了有力的动机，这增强了其对追求国家荣誉的承诺。安倍曾直言不讳道：“维护国家利益、守护基于历史和传统的国家荣耀也是我的工作。”^①于是，有意识地加强特定的话语，并将自身视为这些话语人格化的化身，便与安倍政权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民主党政权后期由实施钓鱼岛“国有化”所营造的日本国内“不屈从于中国”气氛的不断升温，为安倍提供了因势利导的“良机”。他借力打力，竭力诉诸日本外交失败造成屈辱的悲情，并利用公众对经济大国地位滑落心理准备的普遍不足，推动“中国威胁”议题的持续发酵，激起日本社会对“嫉妒”和“耻辱”潜意识的共鸣，从而确立了荣誉至上的价值取向。

话语变化是反映动机层次分布变化的有力证据。自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末期以来，有关荣誉和地位的话语开始频繁出现在日本首相的施政演说、国会质询应答、媒体采访、新年贺词、重大政策起草的基调发言以及海外的外

^① 「参議院予算委員会会議録第十一号」（2013 年 4 月 24 日）、16 頁。http://kokkai.ndl.go.jp/SENTAKU/sangiin/183/0014/18304240014011.pdf。

交政策演讲中。与此相对应的是，重振经济、灾后重建等话题却被摆到次要的位置，相关的话语只是出于安抚民心的考量或被用作激发民族精神的工具，甚至作为第二次安倍内阁政策标签的经济刺激计划在他对国会的第二次施政演讲中也被忽略。^① 具体而言，日本领导人在“夺回日本”“恢复强大的日本”“日本回来了”的语境下，通过三个方面的内容建构，确立了对外政策的荣誉导向原则。第一，从当代日本领先的科学技术、美食和低碳长寿的宜居环境引申开来，前赞先人克服天灾、勇于开拓的民族精神和明治维新创造的亚洲唯一的近代文明，^② 后颂日本战后尊崇自由、民主主义，一路迈向和平的道路以及为亚洲的发展和繁荣做出的贡献，^③ 以一种能够把日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用统一逻辑串联起来的自传体叙述方式，来展现荣誉、激发认同。第二，从明治时代跻身世界列强的历史文脉中，重新界定了日本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作为闪耀在世界舞台中心的国家，^④ 担当起维护世界秩序、维护亚洲和平与稳定的新管理者角色，^⑤ 并在抗衡中国中发挥主导作用。这是日本“大国化”目标的新高度，也是中国崛起背景下日本对新角色的期许。第三，在反省战争罪行和看待战后体制的作用时，强调日本在历史问题上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作为现代主权国家的功能“不健全”。从自我不断强化的“屈辱”情感中，获得了满足狂热的自尊需求的强大动力。“自豪感”“地位”“尊严”作为关键词频繁地出现在各种重大场合的政策宣示中，表明荣誉动机在主导话语认可下已然占据国家动机层级中的绝对支配地位。

安倍曾在第二次上台前夕发表的执政宣言《走向新国家》中誓言，鉴于“经济至上主义不计价值的得失”，必须“开展一场将日本这一国家夺回来交

① 美国媒体敏锐地观察到了这种话语的变化。参见《安倍晋三誓言捍卫日本领土主权》，华尔街日报中文网，2013年3月1日，cn.wsj.com/gb/20130301/bas_095435.asp。

② 「第百八十三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http://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20130228siseuhousin.html。

③ 这方面的话语出现在安倍2013年8月的战败日致辞、2014年2月的“建国日”谈话、2015年2月的施政方针演说、“安倍谈话”起草委员会会议、2015年3月东京联合国大学的演讲和2015年4月美国国会的演讲等重要场合。参见日本首相官邸网站：<http://www.kantei.go.jp/>。

④ 「2015年安倍首相の年頭所感」、http://www.kantei.go.jp/jp/97_abe/statement/2015/0101nentou.html。

⑤ 「第13回アジア安全保障会議（シャングリラ・ダイアローグ）安倍内閣総理大臣の基調講演」、http://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014/0530kichokoen.html。

还给国民的斗争”。^①几个月后，安倍即在访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时宣称“日本回来了”。^②经济社会问题的积重难返显然无法让安倍在短时间里产生如此强烈的自信，真正支撑其底气的是日本价值偏好的“重新夺回”，^③即从沉湎于物质财富的“内向”的日本向追逐荣誉的“外向”的日本转化。

如果说中曾根提出的“国际国家”乃至小泽一郎提出的“正常国家”更多的只是一种战略设想和愿景，那么进入21世纪以来则上升为国家的主要政治议程，并化为具体的政策实践，尤其试图以安保领域的全面突破（法律制度、动员体制、决策运作）作为标志性的“成果”。由此，“正常国家”在身份和地位上的定义才真正具有了地缘政治大国的内涵。这一角色的构建是转折性的，标志着荣誉已经在日本的动机层级中居于最高位置。当荣誉成为主导性的动机时，日本战略偏好便在上述机制的作用下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三、荣誉偏执、身份迷思与日本现实主义的战略偏好

进入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期，尤其是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日本战略选择上的现实主义偏好日益明显，其安全防务政策开始表现出积极的扩张性特征，这已成为近年来东亚安全格局重构的重大变化之一。由于日本战略偏好的现实主义转向与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和中国崛起同步展开，因而这种转向似乎符合地缘政治和安全困境的理论预期。同时，还因为它发生在日本不断加速的右倾化过程和摆脱战后体制图谋的环境中，又自然地为人们建构三者之间的因果联系提供了可能。然而，不论是国际环境还是国内政治因素，都只是作为一种背景性因素而存在，其在多大程度上产生影响取决于某种关键变量的中介性作用。换言之，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究这种转向背后

① 安倍晋三「新しい国へ」、『文芸新春』2013年1月号、132～133頁。

② 安倍晋三「日本は戻ってきました」、http://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013/0223speech.html。

③ 美国著名的日本问题专家理查德·塞缪尔斯（Richard J. Samuels）认为，日本人声称“卷土重来”关乎重新赢得国家声誉。参见 Richard J. Samuels, “A Question for Asia: Is Japan Back?” *The National Interest*, May 28, 2014,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question-asia-japan-back-10546?page=show>。

更深层次的动力机制与行为逻辑。根据上述理论框架，本文认为，荣誉动机是促使日本战略偏好发生转向的主要动因。正是对大国身份和荣誉的执迷，导致了日本在接受冲突的零和性质、大胆贯彻防务上的进攻主义、采取外向性的姿态和推行民族主义议程等行为集合中，确立了现实主义的战略选择。

（一）威胁认知和零和博弈意识的强化

一国对外战略的调整总是从其对所处的安全环境的重新认识开始的。现实主义战略确立的前提是基于本国存在着严重的安全威胁和零和博弈的竞争对手的判断。对日本来说，也正是对国际秩序面临变动和国家安全受到挑战的认知，激发了其现实主义的战略偏好。

日本的威胁认知从何而来？从日本公布的《外交蓝皮书》《国防白皮书》《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战略文件和政界、学界精英的公开言论可以看出，“中国崛起→中国威胁→日本安全威胁”的逻辑演绎构成了其思维逻辑的主要特点。表面上看，这种思维逻辑受到了现实主义的权力转移理论的支配，但如果考虑到同一时期东亚不同国家和日本在不同时期、不同阶层对中国崛起大相径庭的反应，其实并不尽然。而且，即使存在着上述因素，仍需进一步研究以权力转移理论为主臬的动机导向。

日本对战略环境恶化的认知显然是受到地位动机的驱使。从日本对中国崛起的心态变化来看，当经济利益和财富增长成为其主要的政策目标时，一种倾向性的观点是，“对日本企业来说，中国的重要性不仅是作为‘工厂’，更是作为市场”，因此，“两国的互补关系胜过竞争关系，相互合作存在着相当广阔的空间”。^①出于将恢复经济列为政策议程的考量，日本领导人甚至也不掩饰内心的矛盾。安倍公开承认：“中国的崛起对（日本）经济来说是很大的机遇，中国的市场也很有魅力。”^②然而，当日本决策层被荣誉和威望动机主宰时，必然转向从日本能否成为地缘政治大国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崛起。而现实发展趋势导致的心理失落和恐惧，使其更倾向于用“威胁”来定义中日关系，用零和博弈的思维对待两国之间的互动。正如石之瑜所分析

① 関志雄『中国の台頭で変貌する日中関係－日本にとっての機会と挑戦－』、<http://www.rieti.go.jp/users/china-tr/jp/ssqs/140805ssqs.htm>。

② 『安倍首相、歴史観や米国の思い出について語る WSJインタビュー抜粋』、<http://jp.wsj.com/articles/SB12468361420061044368104580605443145601072>。

的，“中国崛起”对日本的冲击未必就是现实主义学者所理解的单纯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更重要的是它将使日本失去一直以来作为东亚国家范形的姿态，造成其面对世界时的一种身份困境。^①在荣誉思维的主导下，日本之所以会产生自己所处的战略环境面临日益严重威胁的认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日本在东亚国际体系中的实力现状处于被对手刚刚超越、但尚未彻底“完胜”己方的特殊阶段，因而在心理上为能够竞争荣誉和体验愤怒的情感保留了空间。第二，日本曾经是亚洲最发达的国家，如今却不得不面对强大的亚洲，这种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严重挫伤了日本所谓的“自尊”。其结果正如日本媒体自我承认的那样：“‘亚洲老大’意识的动摇，正是不安和焦虑的根本原因。”^②第三，日本人口不断减少、经济停滞的现状强化了其对中国崛起后可能夺去其作为地区第一强国位置的担忧。但正如美国的日本问题专家所指出的，这种“威胁与19世纪完全不同，并非殖民地化而是边缘化”，^③因之主要是一种心理恐惧。第四，日本迈向“政治大国”的荣誉目标设定本质上追求的是地缘政治大国，这种身份定位及由此产生的迷思，进一步放大了心理上既存的愤怒、焦虑与恐惧，从而强化了对威胁严重性的判断和博弈的零和思维。因此，导致日本对外在威胁严重性程度感知的决定性因素主要不是中国崛起的发展过程，而是其自身转向荣誉动机的深化过程。同时，这种威胁也主要不是在传统安全层面上的，而是由地位和声誉来定义的。

这可以从日本“威胁意识”指涉对象的主要方面得到进一步证实。日本政界及学界做出本国的战略环境受到严重威胁的评估，是基于对以下三方面的看重和解读。第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对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尤其是中国正在以经济成长为基础，向美国发起“势均力敌”的竞争，试图把国际秩序的中心由美国替换成中国。^④

① 石之瑜：《回到亚洲？——日本认识中国崛起的思想基础》，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4期，第27、31页。

② 「社説：戦後70年日本とアジア脱・序列思考のすすめ」、『毎日新聞』2015年1月1日。

③ Tobias Harris, “The Reactionary Visionary. Can Shinzo Abe Convince Japan’s Voters that the Path to Future Glory Lies in the Imperial Past?” *Foreign Policy*, December 12, 2014, <http://foreignpolicy.com/2014/12/12/the-reactionary-visionary-japan-elections-economy-shinzo-abe/>.

④ 朴喆熙：《日本人观察中国的四种观点》，载《东京新闻》2014年10月26日，转引自《韩学者分析日本人多视角看待“中国崛起”》，载《参考消息》2014年10月27日，第10版。

这将彻底颠覆现有的国际秩序，自然也是作为现有国际秩序重要领导和维护力量的日本的最大威胁。第二，伴随着金融危机以来相对实力的下降，美国不得不实行战略收缩将是大概率事件。鉴于中国会利用自身经济实力，推进形成对本国安全和发展有利的国际秩序，以及韩国将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关系，如果美国对东亚事务的参与度降低，中国将在本地区占据统治地位，日本也将因之面临很大困难。^① 第三，亚太地区的权力秩序逐渐呈现出 G2 支配的态势，^② 中国倡导“新型大国关系”概念，旨在谋求与美国的对等关系。而奥巴马政府倾向于接受，也不排除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中国日益强烈的主张和向海洋等方面的扩张。^③ 未来的结局可能是中国把美国驱逐出西太平洋，日美安保体制、日本独自防卫力量的存在也将被忽视。^④ 显然，对美国主导的西方国际秩序规范的动摇和对日本地位、处境的担忧，使得日本政治精英更愿意相信本国战略环境的恶化和外部威胁的零和性质，相比而言，国土安全并不是他们关注的焦点。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安全威胁在日本战略决策层视阈中无足轻重。对纠结于地位之争的日本来说，既然“范形”身份是其在东亚的安身立命之本，那么地位就不仅仅是一种荣誉，更是国家生存本身。基于此，日本决策层改变了对安全威胁的评估标准，将它与日本地位的得失联系在一起，并导致对中国崛起的消极解读和对中国动向的过度敏感反应。上述威胁界定方式与地缘政治大国的目标导向和身份属性相互作用，自然使日本重回传统安全竞争的旧有模式。

为此，近年来日本不断加大对中国军事威胁的渲染和本国安全的安全化操作力度，采取了现代行为体常用的“在对一种动机做出反应的时候却在利用另一动机来解释和论证他们的行为”^⑤ 的方式，来证明由地位动机引发的对外战略调整是正当的，以便凝聚国内共识和动员民众。这在应对与中国的

① 「20年後のアジア太平洋地域秩序と日本の役割」、<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77719.pdf>。

② 「米中首脳会談 G2では仕切れない」、「毎日新聞」2014年11月13日。

③ 神谷万丈「『インド太平洋』は日本の地域安全保障政策の中核概念たり得るか」、http://www2.jiia.or.jp/pdf/resarch/H25_Indo-Pacific/01-kamiya.pdf。

④ 岡崎（久彦）研究所「米中「新型の大国関係」を米国が受け入れる余地」、<http://wedge.ismedia.jp/articles/-/4837>。

⑤ 理查德·内德·勒博：《国家为何而战？》，第90页。

岛屿与海洋权益之争上表现得最为明显。钓鱼岛“购岛”计划推出后，日本不断强化“西南防御”部署，并进而实现了在“联合机动防卫力量”概念下军事战略转向进攻型的重大调整。中国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和频繁的海洋扩张活动对日本离岛安全和海洋资源构成重大威胁，被日本决策阶层习惯性地用作为自己辩护的依据，然而这只不过是日本领导人为掩盖其政治目的而编造的谎言。撇开中国防御性的国防战略不谈，即使从现代战争的特点和权力竞争的方式以及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国侵占日本离岛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更能让日本产生自信的理由是，“尽管中国一直在投入重金，但日本自卫队的技术优势仍是中国所无法比肩的”。^① 加之美国提供的同盟支持，日本安全保障的基础依然稳固。日本的做法不仅无助于本国安全，甚至在一定意义上会“适得其反”。^② 因为这将使中国被迫放弃长期坚守的“搁置争议”和隐忍战略，采取强烈的反制行为，结果反而会使日本深陷与中国之间的“安全困境”。而如果是出于确保战略资源和能源供应的考虑，日本明智的做法更应该是谋求合作。几十年来东海海洋权益争端的经验显示，石油和天然气田之争反倒激发了建设性对话。自2004年起，中日两国就曾因油气勘探的激烈摩擦而平心静气地展开了一系列会谈。经过四年谈判，最终达成了在边界地区附近合作开发油气资源的协议。^③ 可见，安全恐惧和利益欲望并非日本在东海岛屿争端上顽固坚持强硬立场的真正动机。澳大利亚战略学教授休·怀特（Hugh White）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了这些岛屿或资源开战对任何人来讲都不值，”“这场争端永远都不是关于领土的。”虽然“在一场旨在定义亚洲大国未来数十年角色和地位的竞争中，它们只是些象征符号”，^④ 但更进一步说其实就是试金石和风向标。正是由于执迷于东亚大国的地位和身份，日本战略决策层才不惜以物质财富和安全利益为代价，在岛屿争端上采取战争边缘政策。

① “End Drift to War in the East China Sea”, January 23, 2014, <http://www.ft.com/intl/cms/s/7d713b60-8425-11e3-b72e-00144feab7de.html>.

② Ibid.

③ Emily Meierding, “The Real Reason Tensions are Rising in the South China Sea”, May 24, 2015, <http://www.vox.com/2015/5/24/8646571/the-real-reason-tensions-are-rising-in-the-south-china-sea>.

④ Hugh White, “A Great War in the East China Sea: Why China and Japan could Fight”, *The National Interest*, July 15, 2014,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great-war-the-east-china-sea-why-china-japan-could-fight-10877>.

（二）大胆追求防务上的进攻主义

日本在安保防务政策上转向进攻主义的理念，是荣誉动机影响战略偏好的第二种因果机制产生作用的典型反映。近年来，日本的防卫政策已从专守防御的传统约束中彻底摆脱出来，开始信奉进攻主义。仅从常规的安全动因去理解并不能对此做出很好的解释，因为日本的这种咄咄逼人的“高姿态”不仅远远超出了本土安全的目标和范畴，而且会招致螺旋式上升的“安全困境”。但是，如果是受到荣誉动机的驱使，这便是一种顺理成章的必然选择。在日本决策层看来，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权力对比的结构性变化，不仅使日本“政治大国”的威望失去了立足的空间，甚至面临在区域地位和影响力竞争中边缘化的危险。对损失的预期以及这种损失的固有属性，使日本滋长了风险偏好意识，愿意为了获得大国身份和地位而冒险。而且，从荣誉动机出发，日本精英进一步认为，即便传统意义上的安全不至于受到威胁，但如果不能确保作为政治大国的地位和影响力，就谈不上绝对的安全。日本炒作“中国威胁”的一再升级，实质上是在这种思维逻辑下的受挫心理借助安全说辞的一种宣泄。因此，对绝对安全受损前景的预判，使日本领导人愿意冒险，以便获得更有利的国际地位。这就激发了其在安保防务上的进攻主义偏好，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谋求建立进攻性的军事力量体系。从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日本战略决策层对防卫建设和军力结构做出根本性调整的初衷，是认为“日本安全保障和防卫战略的基本方向是在实现保护本国的和平与安全、维持繁荣的基本目标的同时，还应该立志成为对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的国家。换言之，日本要从被动的和平国家成长为能动的创造和平的国家”^①。这就意味着日本国防战略的指导理念已从固守本土的防御向预防性的主动介入转变，而获得进攻性的军事能力是支撑这一战略的关键，由此引发了自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日本国防预算的连年攀升。从《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力量整備计划》和防卫省的年度预算报告所确定的防卫力量建设和军力结构调整的重点来看，日本所着力追求的两栖作战、预警巡逻、防空反舰、导弹防御、隐形无人机以及在实施远洋机动、海空联合、电子战、网

^① 新たな時代の安全保障と防衛力に関する懇談会『新たな時代における日本の安全保障と防衛力の将来構想—「平和創造国家」を目指して』（2010年8月）<http://www.kantei.go.jp/jp/singi/shin-ampobouei2010/houkokusyo.pdf>。

络太空、“先发制人”等不同作战方式上的能力的大幅提升,^① 都是围绕打造进攻性的军事力量体系展开的,贯彻着以下三方面的意图和目标。一是通过提升两栖战力,实现对广大离岛及其附近海域的有效控制,进而改变战后秩序所规定的地缘政治版图;二是跟上美国亚太地缘战略和军事改革的步伐,实现日美在军事上的一体化,以开展全球范围内对美国干预行动的无缝支援;三是增强远程投送能力、扩大作战半径,确保对地区事务的快速介入和实施对对手的敌人的所谓安全援助。以上种种大大超出了追求本土安全和最低限度威慑力的范围,反映了日本在恢复地区中心力量地位动机驱使下在发展军事力量上的激进冒险。对此,日本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柳泽协二曾明确指出:“就保卫国家的防卫力而言,日本在世界上屈指可数,如果通过扩军来对抗中国的扩张路线,日本迟早会吃不消,必须先要在政治框架中规定现状下的防卫力应该发挥哪些作用。”^②

其次,注重遏制战略手段的全方位推行。早在民主党执政后期,日本领导人即把“在构筑亚太地区的秩序和规则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视为“外交的根本”。^③ 在这一角色定位下,对国际秩序变化的认知必然使其敏感地认识到,中国实力的迅速增强和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不仅对日本的地区主导权构成了严重挑战,使其无法发挥秩序主导者的作用,而且中国的成功崛起会进一步导致以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对现有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的颠覆。因此,基于地区政治大国和西方世界重要一员的双重身份,日本对推行对华遏制“情有独钟”,将其确定为“战略性外交”的核心内容,不断加大精力和资源的投入。在日本战略精英层看来,遏制中国不能简单地从维护自身传统安全的考虑出发,更应以“体系眼光”,即防止东亚体系变为“中国秩序”来理解其深远的意义。^④ 这就使日本在实施对华遏制上比美国更具有战略性、全面性和对抗性,也表现得更为大胆和冒险。

从战略性上看,日本围绕所谓“自由与繁荣之弧”和“民主安全菱形”

^① 参见陆伟:《“联合机动防卫力量”:日本新军事战略的构建和影响》,载《外交评论》2014年第5期,第39~61页。

^② 《日本与其不断扩军不如睦邻》,载《参考消息》2015年8月20日,第10版。

^③ 『第百八十回国会における野田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http://www.kantei.go.jp/jp/noda/statement/2/20120124siseihousin.html>。

^④ 吴怀中:《日本对华大战略简析——以“接触”与“防范”为核心概念》,载《日本学刊》2012年第5期,第76页。

的战略构想，沿三条线路展开布局：一是北线的“美日韩军事三角”，二是南线的“美日澳安全三角”加“美日印三角”，三是“战略地位重要的”东盟国家，^①意在构筑整个印太范围内的对华包围网。从全面性上看，在规则制定、安全结盟、外交挑唆、商贸竞争、外宣诋毁乃至军事谋划等各个层面，多管齐下，形成全方位的联动性施压。从对抗性上看，既有冷战式的意识形态挑衅，将中国贬为政治异己，又在中国和重要战略伙伴间打入楔子，对中国的地区合作倡议找碴作梗，还紧盯中外经贸活动，从中搅局，^②挤压中国“走出去”的战略空间。

日本的上述举措反映了其淡化成本的大胆冒险倾向，表现在日本既愿意承受巨大的安全风险，例如在南海问题上，日本从对菲、越等国的公然袒护，到向它们提供军援，进而发展到举行联合军演，甚至考虑在该区域内巡逻，^③自愿被这些国家绑在对华挑衅的战车上；又不惜以放弃巨额的经济利益为代价，例如，出于削弱中国在地区经济一体化中影响力的考虑，日本不惜承受农业等领域的损失，选择加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④还以各种借口与美国一起拒绝中国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倡议，成为少数几个不是该行创始成员的主要国家之一，从而放弃了原本可以凭借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优势获取可观的经济收益的机会。日本著名学者白石隆直言不讳地指出，安倍政府是基于“在统一制订了世界或者地区规则之后才能被作为一个大国来尊重”的考虑，并希望“通过新安保法制和 TPP 双管齐下维持地区力量均衡”。^⑤这说明日本以遏制作作为对华战略手段的偏好受到了地位动机的驱使，其真正的目的在于压缩中国崛起的战略空间，消除日本成为东亚秩序主导者的最大障碍。

① 张瑶华：《安倍 2.0 时代的日本外交》，载《国际问题研究》2013 年第 2 期，第 77 页。

② 日本争夺中国海外高铁市场便是明显的例证。「中国勢などと火花…鉄道事業、海外市場に攻勢」、『読売新聞』2015 年 3 月 9 日。

③ 「自衛隊の警戒監視、南シナ海も検討へ 防衛相が考え示す」、<http://www.asahi.com/articles/ASH23355BH23UTFK002.html>。

④ 参见倪月菊：《日本的自由贸易区战略选择——中日韩 FTA 还是 TPP?》，载《当代亚太》2013 年第 1 期，第 80~100 页。

⑤ 「（インタビュー）TPPの底流 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学長・白石隆」、『朝日新聞』2015 年 10 月 7 日。

最后，牵头组建亚洲中等强国联盟。与美国结盟不仅使日本获得了安全“保护伞”，还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因而被其视为外交战略的基轴。然而，随着近年来荣誉、地位动机在日本决策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安倍等人日益认识到，实现国家“正常化”这一核心目标的最大障碍来自于战后历史定性对自身制度和心理的束缚，作为当年主要当事方的美国在导致日本不正常状态过程中存在的“历史过失”是无法彻底原谅的。^① 地位动机的掺入，驱使日本政治精英提高日美同盟价值判断的门槛，随之也产生了更多的怀疑和不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将无法有效保护日本”观点的频频出现，其实质是利用中美实力相对性的消长这一公认的事实，用安全话语来掩盖对日本的“正当地位”不能通过与美结盟得到满足的失落情绪。^② 在以“正常化”作为日美同盟新的价值判断标准的情况下，日本一方面在《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修改过程中，将获取同盟框架中的平等地位作为利益诉求的核心目标，以此来为集体自卫权搭建实践平台，从而完成安保体制“正常化”最关键的一块拼图；另一方面利用美国为推行“再平衡”战略而鼓励盟友发展自身能力和它们之间的横向联系的机会，谋求由自己主导的同盟体系，以重塑东亚的均势。日本著名国际问题专家添谷芳秀建议，东亚国家应该改变地区秩序的中心参与者角色，建立基于中等强国联合的有效的合作机制，从而在大国之间的中间地带发挥有效影响力，并特别强调，“理想的情况是，日本应带头促进东亚中等强国之间的合作”。^③ 添谷的意见代表了日本决策层的主流想法。

这一中等强国联盟是指日本分别与澳大利亚、印度、韩国建立以安全防务合作为中心的双边同盟，并在此基础上扩展为三角或四角的多边联合和覆盖其他次区域的重点国家的安全伙伴网络。早在安倍第一次执政时期日本即开始对此进行布局。安倍第二次上台后，又推动了双边关系的全面提升，尤其是促成了与澳、印之间合作的机制化和制度化，将日澳、日印关系提升到

① 刘卫东：《美国对美日之间历史认识问题的应对》，载《当代亚太》2014年第5期，第94页。

② 田久保忠衛『オバマ「宥和」政策で同盟関係に危機?』（2014.02.17）、<http://jinf.jp/weekly/archives/12279>。

③ Yoshihide Soeya, “Middle-Power Multilateralism Bringing China into the Fold”, East Asia Forum, July 27, 2015,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5/07/27/middle-power-multilateralism-bringing-china-into-the-fold/>.

“准同盟”的高度。^① 从现有的发展态势来看，基于下列因素，这一同盟体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日本的地缘政治目标。第一，虽然澳、印等国具有独立地决定国家战略和外交政策的传统，但中等强国的地位使它们对中国崛起可能给自身利益造成的损失更加敏感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为日本不断推进与它们的同盟化进程提供了较为牢固的战略基础。第二，实力对比使日本成为具有相对优势的一方，较容易在互动博弈中取得主动。例如，澳大利亚突破海军力量发展瓶颈的有效路径是靠日本提供潜艇技术，而印度也需要日本官方发展援助（ODA）的巨额资金，还希望尽快从日本获得 US-2 两栖飞机。第三，正因为实力上的相对优势，日本在议程设置上发挥了主导作用。双边和多边合作始终围绕应对中国海洋活动和确保航海自由展开，在很大程度上贯彻了日本的意志和主张。日本追求的中等强国联盟体系蕴含着与美国传统的轴辐体系不同的战略深意，它抓住了“印度洋—太平洋的战略框架是掌控亚洲快速变化轮廓的最好方式”这一关键，并为美国制衡中国可能的失败而寻找替代战略。^② 正如日本战略决策层的核心人物石破茂所言，“我们很可能会看到中国的国防预算持续增长，而美国的影响力日渐减弱。因此，我们将有必要建立一个亚洲版的北约，以便在该地区与中国保持平衡。”^③ 日本多元化同盟战略的选择，反映了其对于国际地位下降的焦虑感和渴望发挥国际作用的内在诉求，^④ 显露了其要在亚太地区均势结构重建过程中获得主导优势的意图。

（三）外向塑造姿态的呈现

战后半个多世纪中，日本一直保持外交上的“低姿态”，在实践中也主要推行以获取资源和市场为目的的“经济外交”，其内向型的、被动反应式特征非常明显，这与物质利益动机占据主导地位的状况是相适应的。然而，这种内向型的低姿态外交近年来已被彻底打破，其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呈现

① 参见朱海燕：《日澳关系“同盟化”的新发展及其前景》，载《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8期，第44～51页；刘思伟：《印日安全关系分析：均势安全论与共同体安全论》，载《南亚研究》2014年第3期，第47～62页。

② 哈尔什·V. 潘特：《日印澳三边框架制衡中国》，载《参考消息》2015年8月3日，第10版。

③ 『目指せ「アジア版 NATO」首相、石破氏に調整指示 実現へ3つの関門』、<http://www.sankei.com/politics/news/140307/pl1403070029-nl.html>。

④ 张云：《中日关系稳定符合双方战略诉求》，载《联合早报》2012年12月30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12年1月3日，第14版。

出主动介入、广泛参与、深度干预的姿态，“积极的和平主义”被奉为圭臬，显示出日本决策层外交偏好由内向型防御转向外向型塑造的根本性变化。

地位和威望动机是日本转向外向型扩张战略的最主要驱动力。2013年12月发表的日本首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明确指出，“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世界，日本应该对地区和全球的和平、稳定及其繁荣发挥比以往更加积极的作用”，这是基于“日本作为国际社会玩家”的角色定位。^①按照安倍政府重要的战略决策智囊北冈伸一的定义，日本必须具备“改变他者行动的影响力”，“要求日本发挥更综合性的力量，并非仅限于经济。同时不是仅着眼于美国和亚洲，而是从更广泛的全球视野，致力于发挥更大的影响力”。^②基于上述角色定位和角色认知，2013年9月，安倍在联大的发言中雄心勃勃地为日本公布了一项极其广泛的全球议程，明确表示，不管是叙利亚问题、防核扩散、联合国维和、打击索马里海盗、发展援助还是妇女权利问题，东京都要拥有发言权。^③安倍政府不仅在言辞上高调介入国际事务，还在行动上积极跟进，与批准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宪法解释、强行表决安保法案，从而构建全球力量投射的合法性授权的制度环境相呼应，倾力推行所谓的“俯瞰地球仪外交”，为全面干预国际事务进行战略布局。

日本政治精英认为，本国在国际体系中所受到的待遇之所以低于其对自身大国地位的认识，主要是由于日本无法像欧美大国那样参与国际社会治理的所有制度性决策过程，尤其是国际安全领域的政治决策。鉴于此，通过对公共物品的工具性利用塑造自身在国际安全事务领域的影响力，就成为其介入国际事务的主要着眼点。日本重点在以下三个方面加大了介入国际事务的力度。（1）在官方发展援助方面。鲍德温（David A. Baldwin）有一句经典名言：“对外援助首先是国家权力的工具……是援助国试图促使其他国家按照援助国的意愿采取行动的手段，因此，对外援助政策就是对外政策。”^④日

① 『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について』、http://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pdf/security_strategy.pdf。

② 北岡伸一『グローバルプレイヤーとしての日本』、NTT出版株式会社2012年、第4～5頁。

③ 『第68回国連総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一般討論演説』、http://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013/26generaldebate.html。

④ David A. Baldwin, *Foreign Aid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 Documentary Analysis*, New York: Praeger, 1996, p. 3.

本的对外援助无论在形式和内容上与美国有多大不同，在本质上也基本符合现实主义的这种理论预期。然而，必须注意的是，在获得国际威望动机的驱使下，日本对外援助在战略方向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布尔（Hedley Bull）认为，一个国家如果宣称自己拥有大国的某些特殊权利，就必须在涉及整个国际体系的和平与安全的重大问题上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它们有义务根据所承担的管理责任对自己的政策加以调整。^①正是基于这一要求，2015年2月，日本政府批准新的“开发合作大纲”，以救灾为名，允许对其他国家的军队和军人提供援助，^②从而实现了对外援助由立足于经济安全的民生援助向着着眼于地缘政治的战略性援助转变。相应地，日本对ODA的重点对象和区域也进行了重新布局，以便对国际事务实行更有效的介入。如日本近年来通过持续加大对印度的援助，获得了对方战略上的亲近，为扩大其在印度洋的军事存在及影响提供了基础。^③（2）在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方面。由于其本身的彰显道义和责任的属性，联合国维和行动成为日本提升国际地位、合法化地开展海外军事行动的切入点和实践平台。对日本来说，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意义就在于向国际社会展示其愿意并有能力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以证明自己享有大国的地位是实至名归的。^④社会流入的身份管理策略的实施，推动了日本以欧美大国的维和行为规范作为学习和效仿的目标，对自己的维和行动从派兵程序、地理范围、活动区域到任务使命、武器携带等进行了多方面的重大调整，从原先以单一的民事任务为主的辅助性维和向更有“质量”的全面深度干预的主体性维和转变。近来日本向在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的韩国军队提供弹药，决定给在该地的自卫队追加“驰援警戒”任务，考虑在联合国维和行动框架之外派遣自卫队参加欧盟的任务部队等种种举措表明，参与国际维和成为日本干预国际事务日益倚重的途径。（3）在参与全球治理方面。日本将提升国际地位和威望同应对美国霸权体系的主要威胁联系在一起，在海洋安全、反恐、涉华和涉俄等国际安全争端的领域，主动走

① 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62页。

② 『開発協力大綱の決定』、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67687.pdf。

③ 杨思灵：《日本对印度的官方发展援助研究》，载《南亚研究》2013年第1期，第94~113页。

④ Shogo Suzuki, “Seeking ‘Legitimate’ Great Power Status in Post-Cold War International Society: China’s and Japan’s Participation in UNPK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2, No. 1, 2008, p. 52.

向前台，竭力显示自己的独特贡献和角色。为满足社会创造的身份管理策略的需要，安倍等人公开宣称日本是“区域秩序的主导者”“世界领导力量”和“阻止权力转移的中流砥柱”，并在推动上述领域的全球安全治理上追求议程的设置和领导角色。如日本在吉布提开设了首个真正意义上的海外基地，在原有的打击海盗任务之外，更着眼于在应对非洲及中东地区的灾害、紧急事态和恐怖主义等方面大显身手。在2014年和2015年连续两年将G7的议程引向对“中俄以实力改变现状是全球问题”讨论的基础上，2016年又撺掇G7外长会议通过了《海洋安全声明》。此外，还组织菲律宾和越南等国策划海洋问题的国际仲裁，推行所谓的“法治遏华”。可见，对外援助和对国际公共物品供给的工具性利用，为日本牟取大国威望和地位的私利披上了“合法性”外衣。为此，在国际事务上积极扮演“塑造者”的角色便成为日本的自然选择。这样，日本越是执迷于大国身份，对国际事务干预的动力就越强。

（四）民族主义议程的推行

一国战略偏好的变化需要相应的国内社会文化做支撑。现实主义战略的转向在文化层面上的变化即是民族主义议程的推行，后者构成了前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本，民族主义议程的核心内容是奉行历史修正主义、重塑传统价值和文化认同、改写和平宪法和民主主义教育。^①这不仅导致了与邻国关系的持续紧张，使自身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在长期不正常的状态下严重受损，而且也引起了主要盟国美国的不满和警惕，甚至有可能从根本上颠覆日美关系架构的合法性。^②对日本上述行为的解释，理性主义的分析路径显然无能为力，因为基于物质性动机对得失损益的权衡应该引导日本改弦更张，而不是因小失大。本文认为，对大国身份的偏执与贪恋所造成的内心设定的自我与现实呈现的自我的分裂，使日本处于不断自我强化的本体性不安全状态，由此产生的焦虑感和挫败感激发了其通过“自传体叙述”以维持本体性安全和自我认同统一性的强烈冲动，从而导致了以否认战争罪行、美化殖民侵略、拒不道歉为主要特征的民族主义议程大行其道。

^① 毛里和子：《中日关系——从战后走向新时代》，徐显芬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52页。

^② 关于这方面的详细讨论，参见刘卫东：《美国对美日之间历史认识问题的应对》，第76~94页。

本体性安全是基于身份稳定的安全，它对于一国的重要性在这一社会心理学概念被斯蒂尔（Brent J. Steele）、米岑（Jennifer Mitzen）、辛瓦尔（Catarina Kinnvall）等人用于分析国际关系和国际安全问题后得到了确认。^①在他们看来，国家是具有社会动机的行为体，除了物质生存之外也追求社会存在。实现本体性安全的前提条件是呈现统一的身份。如果国家没有稳定和连贯的身份，没有确定的行动框架，它就无法与外国沟通，也无法使国际社会对自己的行为形成合理的预期，进而还会危及国家对核心价值的保护，影响个体成员对群体的归属感和自尊心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体性安全是一种最基本的生存需求。^②

如前所述，基于对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和地位的过分期许，近年来，日本的本体性不安全的危机心理日趋严重。在日本保守的政治精英看来，历史问题是造成本国本体性危机的根源。一方面，历史定性带来的制度约束从根本上限制了日本发挥国际政治影响力的空间，使其在无政府秩序下最能显示大国实力和威望的安全领域长期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另一方面，因战争犯罪记录激起的“谢罪”和“道歉”的正义呼声，使日本背负了沉重的道义责任和负担，阻止了其向战后走和平主义发展道路的良好记录叙事转化的实现，对提升国际形象、构建国内认同造成了巨大障碍。很显然，日本政治精英将因自我构建的“政治大国”地位与国际安全领域政治决策权的缺失所造成的精神和身份的分裂主要归咎于历史问题。

国家对本体性安全的追求是通过维护本国的民族主义、身份和价值观（文化中心主义）等形式体现出来的。^③由于历史问题成为本体性安全危机的

^① Catarina Kinnvall, "Globalization and Religious Nationalism: Self-Identity, and the Search for Ontological Security",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25, No. 5, 2004, pp. 741-767; Jennifer Mitzen, "Ontological Security in World Politics: State Identity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2, No. 3, 2006, pp. 341-348; Brent J. Steele, "Ideals that were Really Never in Our Possession: Torture, Honor and US Ident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2, No. 2, 2008, pp. 243-361.

^② 景晓强：《身份、情感与对外政策——以本体安全研究为中心的讨论》，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4期，第57~68页；Ayse Zarakol, "Ontological (in) Security and State Denial of Historical Crimes: Turkey and Jap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4, No. 1, 2010, pp. 3-23.

^③ 包广将：《东亚国家间信任生成与流失的逻辑：本体性安全的视角》，载《当代亚太》2015年第1期，第45页。

根源，而稳定的身份是通过连续统一的话语和实践呈现的，具体而言，就是在言语行为上依赖于统一的自传体叙述，把自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以统一的逻辑加以叙述，因此，在偏狭的自尊的驱动下，日本根据满足持续的自我感的需要，对自我认同进行反思性理解的结果，就是变本加厉地强化对战争罪行的美化和篡改，大力推行以历史修正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民族主义议程，进而固化为“不道歉”的战略文化。这种战略文化呈现出来的新特征在安倍的战后 70 周年谈话中得到了集中体现。^①（1）“双重标准说”。基于西方大国的身份意识，将日本对中国和周边国家的侵略与欧美殖民统治相提并论，认为唯独要求日本谢罪是一种双重标准，是胜者对败者的惩罚。（2）“被动应对说”。将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归咎于西方的殖民统治给日本带来的危机感，辩称由此导致的孤立使日本被迫做出应对，试图以构建“新的国际秩序”为目标而成为国际社会的“挑战者”，从而在世界大势中“迷失”。（3）“正面遗产说”。称颂日本对邻国的侵略是帮助它们摆脱西方殖民统治的解放战争，强调日本民众为此做出的巨大“牺牲”。不仅修改旨在追求平衡表述的教科书审定标准，停止重复自我批评的所谓“自虐”行为，还在标志性的军事装备上恢复历史旧称，甚至为军国主义遗物申遗，以保持自传体叙述的统一，激发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4）“历史眼光说”。质疑日本观的片面性，提出日本叙事的视角“不应停留在战争年代，而是要置身于更长的时代背景中”^②，尤其要强调日本在二战后为维护地区稳定和繁荣做出的贡献。其背后的逻辑是，日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均一以贯之地保持着良好的形象，那些指责日本在走向修正主义的批评是不成立的，^③即使存在着不良记录也足以能够“将功补过”。

显然，日本已把推行以历史修正主义为核心的民族主义议程作为建构政治大国身份的关键前提和文化认同基础，即试图通过对历史问题的重新解释，塑造符合“合法大国”道义标准的形象，平衡自我构建和外在承认的张

① 「安倍首相の戦後 70 年談話」、http://www.kantei.go.jp/jp/97_abe/discourse/20150814_danwa.html。

② 北岡伸一『侵略と植民地支配について日本が取るべき姿勢』、『中央公論』2015年9月号。

③ “Japan’s Foreign Minister Says Apologies to Wartime Victims”, April 8, 2014, <http://www.nytimes.com/2014/04/09/world/asia/japans-foreign-minister-says-apologies-to-wartime-victims>.

力，以达到内外协调的身份稳定。但事实是，日本大国欲越是膨胀，其本体性不安全的感知就越强烈，就越有动力从民族主义议程中获取“自传体叙述”的统一；而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则导致周边国家日益增强警惕和不信任，使其更加失去成为“合法大国”的道义基础。对荣誉和地位的偏执使日本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难以自拔。

四、结 论

相对于权力和结构等物质性因素，精神、身份和认同因能够深刻揭示一国行为的文化根源而成为当今国际安全和冲突研究的转型方向和发展趋势。本文借鉴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通过对荣誉这一精神性动机内涵的重新界定和理解，拓展和细化了荣誉动机下身份迷思和地位偏执与国家现实主义战略选择的内在关联和因果逻辑，用以分析 21 世纪以来日本战略偏好的重大转变。

本文认为，进入 21 世纪以来，日本文化上的最大变化就是确立了荣誉在国家动机层级中的绝对支配地位。正是因为这种传统价值观和思维与不断演进的“正常国家”实践相结合催生的对大国身份与地位的执迷和狂热，使日本在战略取向上越来越倾向于接受冲突的零和性质、大胆贯彻防务上的进攻主义、采取主动塑造国际事务的外向性姿态和推行民族主义议程等，从而导致了其战略偏好向现实主义的重大转变。本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在回归决定人和国家行为的动机这一逻辑原点的基础上，将体系结构和国内政治等各层次的变量整合到统一的分析框架中，^①从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日本对外战略的深层次动力机制和行为逻辑，并为改变迄今在日本外交安全战略研究上偏重于具体问题，以政策分析为导向、理论化程度较低的现状，对理论分析框架构建的可行方向和路径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应该指出的是，荣誉是一种内隐的存在，很难量化，其行为结果与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预期在呈现方式上往往具有相似性。考虑到这一点，本文对两种理论能够提供的解释进行了比较。一种理论成立的要诀在于它在与其他理

^① 袁伟华：《对外政策分析中的角色理论：概念解释机制与中国—东盟关系的案例》，载《当代亚太》2013年第1期，第154页。

论的竞争中能够提供对事实更加合理的解释。本文并不期望对荣誉动机进行决定性的检验，而是致力于评估其逻辑与经验的适用性和合理性。同时，也不完全否定已有的其他分析视角，而是要推动理论的多元化，从文化的视角丰富对日本战略动机和政策选择的研究。当然，深化这方面的研究，必须明确荣誉和身份动机的主导性地位如何衡量，它与其他动机相比在决定日本战略选择上应如何区分，主导动机的转变是否意味着战略文化的演化，这种动机的形成在何种条件下会发生逆转，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未来研究有待拓展的问题。

由于荣誉和地位动机已在日本政治中占据主导地位，虽然未来日本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手段和方式可能会随执政党和内阁的更替而出现调整，但其战略选择日益呈现出现实主义偏好的总体态势不会发生改变。因此，中日关系的磨合将长时间地在摩擦甚至激烈对抗中实现。但这并不意味着面对中日关系的困局和日本给中国造成的战略压力就只能一筹莫展、无所作为。本研究的政策启示是，我们要秉持“命运共同体”理念，一方面，通过“经济外交”，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利益为纽带，构建包括日本在内的相互依存的关系网络；另一方面，加强与亚洲各国尤其是日本民众的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从全球性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着国际社会新型共生关系的认识中，逐渐提升彼此之间的集体意识和对区域共同体的认同，从而使日本荣誉偏执驱使下的排他性的大国身份追求失去生存的空间，而不得不回归区域一体化建设的轨道。